

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

《家族合唱》創作始末

林懷民 雲門藝術總監

五歲那年，我問母親，我在哪裡出生。「嘉義病院。」嘉義病院我知道，從家裡十分鐘就可以走到。我又問，我出生時怎麼樣？「很乖，每次抱你躲到地下室，都不哭。」為什麼到地下室？「外面亂了，」她說。

六歲那年，我從五斗櫃翻出照相簿，赫然發現母親穿著和服，父親披著黑斗蓬站在大學門口，像日本片裡的俳優。母親只說那是在東京拍的。她笑著把照相簿收起來，叫我以後不要亂翻。再看到母親的相簿，是我三十歲以後的事。

隔壁洪先生是遠房堂叔，留學中國，嬸嬸穿著陰丹士林布的旗袍。他們家的相簿另有一番風景。嬸嬸指點照片，告訴我一些奇怪的地名：北海，天橋，頤和園...嬸嬸天下麵條，也常包餃子。母親愛煎菜脯蛋，有時用黃蘿蔔和肉鬆捲壽司給我們吃。小孩看電影不用票，大家族裡大人多，我常上電影院。父母親帶我看《丹下左膳》、《翠堤春曉》。嬸嬸帶我去看了一部國語片，有個大眼睛姑娘動不動就甩辮子，一直在喊：「爺爺！爺爺！」多年之後，我才發現那是沈從文《邊城》改編的《翠翠》，林黛的成名作。

「外面亂了，」母親說。多年之後，我才發現我出生不久後的那個動亂，便是二二八。

二二八，我模模糊糊知道一點。族裡那位三十歲就哭壞身體，哭白了頭髮的三嬸仔的先生，我的堂叔，就在二二八後無故失蹤。直到去世之前，她始終相信，門開處，他就要回來。夜深後，在我昏睡後又驚醒的迷濛裡，大人壓低聲音，夾著嘆息，談起嘉義驛前的槍決。

對白色恐怖，對二二八，對台灣的認識，我用了很多年，特別是在美國讀書那三年，一點一點慢慢拼組起來。解嚴後，文獻大量問世，我抓到什麼，就讀什麼。

與台灣史料重見天日平行發展的是老照片的出土。尋常國家，老照片是現今生活的一部分，從明信片到書籍到海報到公共場所的裝飾，無所不在，個人從照片的河流裡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族群在照片裡歸納出美的典型。

光復後，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戰爭的國民政府，不遺餘力地消除日治時代留在台灣的遺跡，二二八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，更使民眾不敢輕舉妄動。光復前的圖像長期由媒體，由社會失蹤。我終於明白，童年時母親要求我不要亂翻照相簿的隱情。

一九九四年，故鄉新港文教基金會發動鄉親搜尋老照片，舉辦「親近新港」攝影展。百張照片見證了十九世紀末到今天的百年庶民史。鄉民扶老攜幼，旅外新港人兼程返鄉，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。地方耆老容光煥發地指點照片，為小輩陳述家族與新港的歷史；彷彿照片公諸於世，他們的青春，他們悲喜交集的生命才有了具體的證據。這次展覽我看得驚心動魄，每份圖像都與我血肉相連。活到四十幾歲，初睹百年圖像，全然新鮮的經驗，不是懷舊，是「新發現」，生命突然有了完整的「記憶」，有了一份強烈而複雜的歸屬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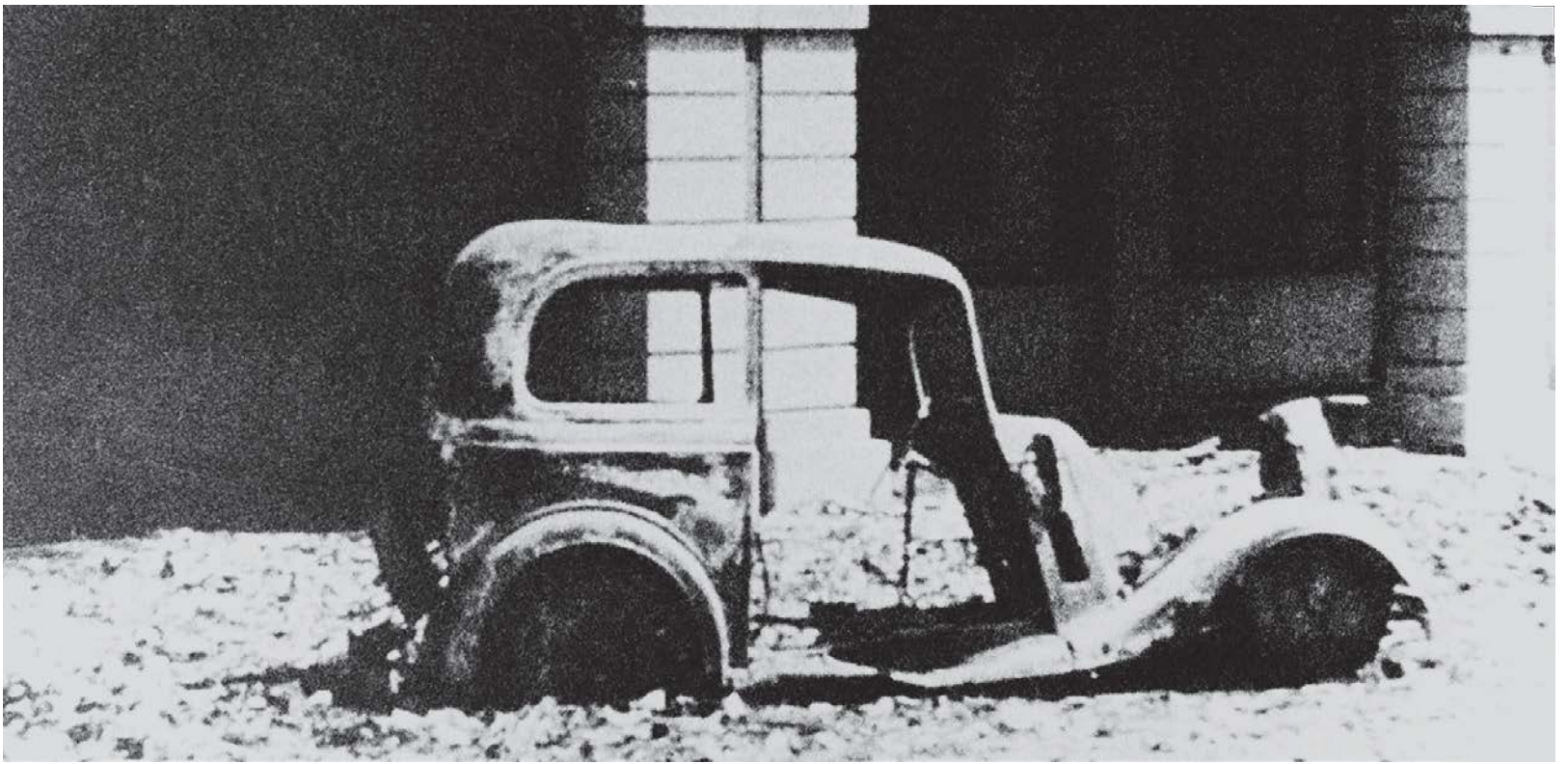
我渴望能把這樣的感動和更多人分享，希望能將老照片用大幅幻燈在舞台上「頂天立地」地呈現。我開始蒐集老照片，同時決定把舞蹈題名《家族合唱》。

蒐集到兩千多張老照片，包容了各個族群在不同時代的留影。長袍馬褂留著辮子的仕紳，在簷前與家人團圓合照。日軍在操場上升起了國旗。大陳撤退。二二八在大稻埕留下一輛殘破的轎車。遊行的學生撐起漫漫似海的蔣中正肖像。水災過後，一個婦人坐在泥濘裡號啕大哭。一家六口合騎一輛摩托車。榮民撩開衣裳亮出愛國口號的刺青。遊行的隊伍中一幅毛筆大字的「獨」...

每個時代都有天真的嬰兒，有嬌柔的青春，有人結婚，有人去世。所有的臉龐都有一份素樸耿直的神情——直到八〇年代。

朋友給我一部完整的家族相簿，年代最早的一張是在酒泉的結婚照。在台灣他們為孩子的週歲點起一根蠟燭，他們送孩子上幼稚園，送孩子到車站坐火車入伍當兵...他們逐漸衰老——他們的相簿流到舊書攤！

眾多照片裡，最讓我著迷低迴的是一些年輕的容顏，



二二八事件被焚毀的車輛 提供中央社

眉宇之際閃著英氣，嘴角有一絲堅持。林茂生，陳忻，陳澄波，潘木枝，阮朝日，郭琇琮...青春圖像竟是最後的遺照。午夜端詳這些肖像，我渴望和他們交談。而那渴望，就像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，無止盡地響在深夜的大海上。

「因為外面亂了。」經過將近四十年的歲月，像剝去層層筍皮，終於，我面對了一項事實：代表嘉義市民到水上機場和國軍協商而被逮捕的畫家陳澄波等前輩，也許就在我躲到病院地下室的時候，在嘉義火車站前慘遭槍決。每思及此，我悚然驚動，甚至無由地歉疚起來。

我重新閱讀台灣近代史料，在台北，在雲門海外巡演的劇院，旅館和飛機上尋思《家族合唱》何去何從，面對代表百年歷史的照片，我到底要說什麼？

台灣是個女人。從荷蘭殖民到明鄭，滿清，日治，到國民政府遷台，台灣人民從未有發言權，只像是被送作堆的舊時代弱女子，悲情而無奈。

台灣近代史裡，充滿了堅持的女性。丈夫滿腔熱血或無妄地消失後，女人嚙下苦楚，勉力持家養大孩子，同時活下來，在新的時代裡，宣述了教科書與媒體不曾記載的台灣歷史。

女性的獨舞成為《家族合唱》的重要特色。然後我在一大堆動作材料裡摸索，無法決定所有動作的溫度與調性。《薪傳》十九年之後的台灣，使我無法再以沸騰的熱力來擁抱歷史。白曉燕事件給了我重大的刺激。白冰冰住家前面，擠滿販賣香腸的攤販和販賣新聞的媒體。是的，我們急躁，不安，而且冷漠面對悲劇；面對歷史，我們冷漠，因此健忘。是的，我也是那賣香腸，或那買了香腸冷心冷眼看熱鬧的「路人」。我嚙下對世界和自己的厭惡，讓雲門舞者不苟言笑地起舞。

編作斷斷續續在八里和歐洲的城市進行，在我完全瞭然之前，排練場安安靜靜躺下一個又一個人體，我請舞者用

粉筆在地下勾出那倒下的輪廓，彷彿宣告那裡曾有一個生命存在。然而幾段舞後，舞者的腳步拭去了那些白線的輪廓。我為此驚悚。這些逝者就這樣被時代的腳步抹去，從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消失。

在毫無預設，完全出乎自己想像的狀況下，《家族合唱》自己發展開來，成為一闕傷逝悼亡的輓歌。

雲門也邀約專人進行田野調查，訪問了原住民、閩南、客家、大陸各省，諸多不同性別、不同族群、不同世代的人士。這些口述錄音涉及生活、歷史，更重要的，話匣子打開後，受訪人一再提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悲情歲月。解嚴了，過去不能說，不敢說的心事，通通攤到陽光下。這些不同口音的見證，成為《家族合唱》主要的「聽覺風景」。

《家族合唱》打開歷史的黑盒子，以「洗滌」做為舞作進行的主軸。洗臉、刷牙、洗頭、洗澡等日常生活動作，變幻成令人目不暇接的舞蹈語彙。舞到終極，真水上場，舞者就著臉盆洗臉，淨身。舞獅、乩童、神轎、拜廟、燒王船，這些色彩艷麗的傳統祭儀穿插出現。舞至終結，數十盞水燈，靜靜地流過舞台...

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，《家族合唱》在台北首演，雲門舞者在歷史影像與聲音裡起舞。我們以近於舞台鏡框大小的面積，呈現數百張老照片。我希望這些影像的組合，能夠給觀眾帶來我曾從老照片感受到的震撼與滿足。照片裡的人物絕大部分辭世已久，有飽受改朝換代之苦的在地人，也有避秦南來，埋骨台灣的第一代移民；是這些族群的組合，才完整構成這塊土地上的「台灣人」。逝者的容貌重新在眾人面前出現時，應該也是一份莊嚴的存在吧。

把尊嚴還給逝者，我們才能擁有尊嚴，而不再自暴自棄。真誠面對了傷痛，我們才能比較健康的期許未來吧。